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尼采形而上学研究

王仲祥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尼采后期坚持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反形而上学者,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拒绝承认的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之后他又完整重构了新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批判性主要针对传统形而上学抽象方式或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目的论,而重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利用抽象思维为世界生成变化概括出一种本质或基础——权力意志;二、阐释或者建构人类主体性——超人;三、寻求一种时空超越性慰藉——永恒轮回。尼采深刻影响了西方形而上学史,具有巨大的转折性意义。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尼采批判性的成分,拒绝其新的形而上学建构,这一现象是形而上学自身消解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关键词: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形而上学;权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4-0053-07

尼采形而上学研究一直是尼采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领域。争论集中于:尼采的思想批判是指向形而上学的,但他的学说本身却又充溢着形而上学特性。有学者认为:“他(尼采)在重建一种作为世界总体解释的形而上学的同时,扬弃了那种作为终极真理体系的形而上学。”^{[1]6}这一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值得进一步讨论。在将尼采形而上学系统分为三个层次之后,所谓作为终极真理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在后两个层次,即超人和永恒轮回中依然可见踪影,可以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的尼采,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思想,却也因此,在一种否定与肯定参半的复杂性中,完成了形而上学的重构。对尼采形而上学这一复杂性的认识,在后现代主义的继承与批判中最为明确地显现出来。以往研究者,即使认识到了尼采的形而上学重构,也仅是集中于权力意志进行论述,对超人与永恒轮回思想关注不足,没能认识到这三种思想是尼采形而上学紧密联系的不同层次,必须进行递进式的研究。本文选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研究尼采形而上学,是一个有利的切入角度。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基础:第一,

这部著作充满批判性的内容,主要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这是尼采形而上学的基础,唯有明确传统形而上学中可批判的地方,才能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进行新的建构;第二,这部著作以伦理学为主要内容,而伦理学,至少在传统哲学中,必然以一定的形而上学为基础,这就提供了一种反溯的可能,即在伦理学的表象中反溯其形而上学本质;第三,如前所述,只有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具体阐释超人与永恒轮回思想之后,尼采的形而上学重构才真正完成。

“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这可概括迄今为止的世界史。”^{[2]114}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可能略为极端,但至少这句话可以改为:“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这可概括迄今为止的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历史。”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总是难以分隔,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产生与被产生,尼采的形而上学更是与虚无主义密切相关,加缪在《反抗者》中进行过系统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形而上学一直是一个难以统一的概念,有“物理学之后”、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各种解释。在我看来,形而上学有三个紧密相连

收稿日期:2018-6-22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710285001Z)

作者简介:王仲祥(1995—),男,河南周口人,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且递进的层次:一、利用抽象思维试图为世界及其生成变化概括出一种本质或基础;二、阐释或者建构人类主体性;三、寻求一种时空超越性慰藉。第一层次是基础,是形而上学的根基,甚至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哲学的开端。第二层次产生于第一层次之后,即相信自己可以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相信人类可以掌控存在,人生值得一活,人具有主体性地位。第三层次是形而上学的最深层次,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力量”所在,对生命苦痛与短暂的难以忍受促使人们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之上,寻求一种超越当下短暂时空的慰藉,灵魂不朽、往生天堂、机械的永恒轮回等都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尼采也正是在这三个层次上,批判而后重构了形而上学。

一、作为形而上学基础的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主要作为伦理学内容出现,作为宇宙观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权力意志当然是在《权力意志》中被具体提出与论述。权力意志最出色的阐释者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吉尔·德勒兹。在《能动与反动》中,德勒兹从身体入手,认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力之间的关系界定了一具身体,随后又将力区分为低级的反应的力和统治的能动的力,并讨论了力的量与质。德勒兹引用了尼采解释权力意志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力的胜利概念——我们的物理学家用它来创造上帝和世界——仍然需要完善;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志赋予它,我把它称为权力意志。”^{[3]107}“权力意志因此归属于力,然而这种归属却是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它既是力的补充又是某种内在于力的东西,它不是作为属性归属于力。……权力意志就是力的系谱学因素,它既是区分性的又是起源性的。”^{[3]107-108}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单子论和泛灵论的结合,却尽力避免着机械论、形而上学抽象和神秘主义倾向。莱布尼茨认为,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力而不是广延,物体则是各种力的复合体,各种各样的力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单子,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单纯的实体,既真实又实在,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失。莱布尼茨还认为单子具有某种“知觉”和“欲望”,只不过在某些单子中不够清晰,这种观点已然包含着泛灵论或称物活论的倾向,尼采则在权力意志中将泛灵论突出化。泛灵论认为万事万物中都存在一种“灵魂”,而不只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这种观点

本身神秘主义倾向十分明显,尼采则在权力意志中通过力的概念减少这一倾向。然而尼采最终必然是拒绝莱布尼茨的,因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与预成论相结合,认为每个单子都带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拒绝所有外在影响,自身决定一切演化。尼采的权力意志突出强调着各种力之间的关系与影响,同时坚定地拒绝任何形式的目的论。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权力意志集中体现于《超越自己》一章中,“只有在有生命的地方,那里也才有意志:可是这并非追求生存的意志,而是——如我所教——追求强力的意志!对于生活着的人,有许多东西比生活本身还具有更高的评价;可是从这种评价本身的嘴里说出的却是——追求强力的意志!”^{[4]130}意志不再是如叔本华所认为的盲目地追求生存,而是求强力求解放,甚至为求强力愿意放弃生存。权力意志就这样成为解释和评价人类历史的基础,一部强者与弱者的、征服与屈从的、斗争的、生成的历史。权力意志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通过与力的结合,以及在诠释作用之外加入评价作用,这其实是在重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康德式的。康德在形而上学史中同样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他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尼采。康德著名的先验逆推,改变传统线性的思维方式,最终成功地在哲学中引发了“哥白尼革命”,即得出“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观点。尼采权力意志观点的成型,一种批判后的重构,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权力意志受康德影响的另一点体现在力的综合中,综合概念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尼采则将它应用于权力意志,确立为对立的力的区分性和起源性因素。

权力意志使身体而不是灵魂成为新的“自我”,“我的弟兄,在你的思想和感觉的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发号施令者,一个未识的智者——他名叫自己。他住在你的肉体里,他是你的肉体。”^{[4]32}权力意志成为尼采重构人类主体性的基础,也就过渡到了形而上学的第二层次。

二、“上帝之死”与尼采主体性重构

上帝死了,并不是尼采反基督教的宣言,而是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比喻。尼采生活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普遍的信仰缺失和人类主体意义的稳定性逐渐瓦解。传统形而上学濒临崩溃,虚无主义席卷欧洲,其中消极虚无主义的代表正是尼采

的前辈叔本华。后期的尼采以各种方式批评叔本华,却仍然肯定他直面虚无主义的勇气。“基督徒必须信仰上帝的真实性:遗憾的是,他们在那里得忍受对《圣经》及其‘自然科学’的信仰;他们完全不允许承认任何相对的真理。”^[5]科学的发展不停用相对颠覆着世人对绝对的信念,基督教本身对《圣经》的错误理解又使其坚持着这一信念不愿和解,然而无论和解与否,信仰的缺失都无法避免,上帝既死于与科学的不和解,也死于和解。尼采没有在这一冲突中单方面地选择信任科学,他对科学有着清醒而复杂的认识,既承继着浪漫主义,又启示着现代主义。

为何说基督教对《圣经》存在误读?哈罗德·布鲁姆的一段论述非常值得在此引用:“J(布鲁姆认为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原始作者)的耶和华是人类——太有人性了:他吃吃喝喝,还经常发脾气,喜欢寻衅开心,嫉妒心重、报复心强,自诩公正却不断徇私;在将祝福从一位精英身上转移到整个以色列人时,他又变得神经质似的焦虑不安……产生经典的这种原创性所隐含的强大冲击使我们认识到,不论虔诚的修订者们如何拼凑,西方世界犹太人、基督徒等对上帝的崇拜只是对一个文学人物的崇拜,即J的耶和华而已。我所知道的可与之相比的震惊有两个:一是基督徒敬爱的耶稣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杜撰的一个文学人物;二是当我们颂读《古兰经》并聆听唯一的安拉的声音时,这个声音是由其先知穆罕默德大胆地详细记录下来的。”^[6]布鲁姆的论述虽然精彩,却不是原创性的,尼采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认识到了宗教教义甚至形而上学并不能直接通过现实语言理解,而是要通过比喻。“一切不灭者——不过是比喻!诗人们说谎说得过分了。”^{[4]92}误读产生,并直接导致了尼采所极力批判的充满谬误的基督教历史。加缪总结道:“基督教的历史只不过是对于基督启示的漫长背叛。”^{[2]194}基督教历史的最大背叛就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变质,这一点贯穿千年,也是导致上帝之死的病症之一。

《出埃及记》中,当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法典而迟迟不下山,百姓委托亚伦造了一只金牛犊作为偶像祭祀,耶和华大怒甚至扬言要将他们灭绝,他命令摩西让百姓自相残杀,“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7]因造了一只牛犊而导致如此大的灾难,正是《圣经》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不

可盲目地进行偶像崇拜。金牛犊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一种残留,生产力尚未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时期,人对自然始终存在着敬畏之心,主体性尚未确立,各种图腾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的原始形式,唯有寄托于各种自然之物,人类才有信仰的力量得以正视存在。《出埃及记》描述的正是人类主体性逐渐确立的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面对自然的无常虽然仍有恐惧,但已逐渐有了掌控存在的信心。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在于他把哲学的对象聚焦于人,随后,柏拉图以一整套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奠定了后来基督教形而上学的基本内核。“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超自然的世界秩序。”^{[1]10}基督教每一次提高上帝的地位,也都是在提高人的地位,前经院哲学时期的圣奥古斯丁,在上帝全知全能性的建构中将上帝提高到新的高度。

可惜的是,人的主体性在两个层次上发生了变质。第一层次的变质是,以来世否定现世,上帝之城战胜了人间之城,若不是基督教禁止自杀,中世纪的自杀率一定是惊人的。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竭力反对这种变质,重构人的现世意义的主体性,这些运动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讨论。尼采对这种变质的批判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十分明确:“是病人和濒死者,他们轻视肉体和大地,想出天国的事物和拯救的血滴:可是就是这些甘美的阴森森的毒,他们也是从肉体和大地那里拿去的。”^{[4]29}尼采认为,这种变质的实质是自身的无能与自我的失望,或者用更加尼采式的术语表述,是权力意志的衰弱,不敢正视没有神、背后世界和形而上原理的现实,所以是“病人和濒死者”。主体性变质的另一层次主要是伦理学的,既然现世是短暂的,只是通往天国的一段旅程,那何不聆听基督的教诲,为自己谋取来世的幸福与永恒?基督教道德就这样在否定现世的基础上否定了“自我”,形成了西方“他者中心论”的伦理学顽疾。各种人文主义复兴运动并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一疾病,至少在这一点,尼采是非常有创见的。查拉图斯特拉刚下山,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隐居森林的白发老者——一位虔诚的圣人,这是“他者中心论”极端化的代表。“We can already see why no dialogue is possible with the saint. He lives entirely in relation to this Otherness called God, and

so he has no 'I' with which Zarathustra could converse. (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和圣人无法交流,他完全生活在与被作为上帝的他者的关系中,因此没有自我,查拉图斯特拉便无法与之交流。)[8]尼采就是要通过查拉图斯特拉,治疗这种疾病,为人类寻回“自我”。而尼采针对的,当然不只是基督教,事实是,基督教可在不同程度上视为所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比喻。

人类主体性的变质是历史性的、结果性的,而主体性的丧失则是时代性的、过程性的。科学是这种丧失的主因,从哥白尼的日心说或许更早开始,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不断提醒着人类,“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只是一句谎言。达尔文与进化论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尼采同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像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那样持有乐观主义,并在进化理论中找到无限进步的许诺。相反,尼采对于达尔文否定人兽之间的肉体差异这一事实中所暗含的潜在危险感到震惊:这种学说可能会摧毁西方传统中人类的独有尊严,尼采担心人们因而完全丧失彼此间的尊重,并且会有极为糟糕的历史结果。”[9]466

尼采最为后人所熟知的超人正是他重构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概念,很难想象尼采在这个概念中没有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4]10度过桥梁而后到达的目的,没落而后在废墟中重新站起的正是超人,超人是查拉图斯特拉教以世人的生存的意义、大地的意义,只有在超人身上,从传统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权力意志才得以真正的追求强力、不断创造、不停超越。尼采自认为超人是真正无神论的,他宣称:“古老的神祇早已完结了:——真的,他们获得快乐的神祇的善终!”[4]211正如狄俄尼索斯被撕碎而后重生的身体的象征,超人也象征着完全衰落而后重生的人类,许多阐释者习惯称之为后人类物种。尼采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耶稣也是这样一位死而复生者,只不过没有被撕碎而是被钉上了十字架,末日审判之后,新的人类诞生于上帝之城,这不正是正统基督教的信条?特里·伊格尔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由于他凌驾于自然的权威以及高贵的自我依赖,超人更多的是神的意味,意即,讽刺的是,上帝终究没有死去。将会取代他的仍旧是对他的想象。”[10]178或许只有在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

意义上,超人才是无神论的,即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独立存在的永恒不灭的本体,无论这个本体是恒常流变的还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不把权力意志归为本体论,而超人,至少在我们可理解的范畴中是有死的且有勇气意愿死亡的。那么形而上学的第三层次,时空超越性的慰藉是否无法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实现?主要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出现的尼采最后的最为得意的思想——永恒轮回正是形而上学第三层次的建构。

三、反目的论与永恒轮回

永恒轮回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铺垫许久,是查拉图斯特拉多次欲言又止酝酿许久才得以成熟的无限深刻的思想,集中于第三部论述。轮回观在宇宙观上并不少见,至少在斯多葛学派已经出现,但斯多葛学派的永恒轮回是一种机械的轮回观,每一次循环的世界在所有细节上都相似,因为所有世界都是根据同一法则产生与发展的。轮回观极易陷入形而上学目的论,并与自由概念产生冲突,不同时期持轮回观的思想家都要用大量论述试图解决这种冲突,或者选择反目的论的轮回观,或者选择目的论但试图与自由意志调和。尼采十分不愿意自己的永恒轮回被理解为机械的宇宙观,他拒绝形而上学目的论,这一拒绝是激烈的彻底的又是存在矛盾的,这一拒绝也是他反对康德的重要内容。“‘von Ohngefähr’(偶然、意外)——乃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我把它交还给万物,我把万物从受制于目的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4]189尼采认为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必然性规律,在这种反目的论的基础上,权力意志的自由在永恒轮回中成为可能。反目的论同时意味着反对绝对意义上世界的起源与终结,这也为永恒轮回准备了一种无限的时间观。

对于永恒轮回,在基本的宇宙观之上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解是存在困难的,一方面,尼采对这一思想的阐释实在少之又少,且确实深奥而晦涩,另一方面,尼采的阐释者们提出了太多自己的理解,没有统一且不可能统一。在这其中,海德格尔的阐释非常重要,是一种值得引用的存在主义的解读。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谬误在于人类中心论,人类从存在变成主体,这是对“subject”的一大误解,人应当作为存在者存在,但不应当是世界主宰性的存在。[11]8尼采的三个紧

密联系的思想:权力意志、超人和永恒轮回,正是在纠正这种谬误。“身后的这条长路:它通向永恒。向前去的那条长路——它是另一个永恒。这两条路背道而驰;它们正好碰头在一起——在门道这里,就是它们的相会之处。门道的名字写在上方:‘瞬间’。”^{[4]178-179}身后的路指向过去,向前的路指向未来,它们相会之处即是现在。“‘某天’和‘从前’,将来与过去,也‘有如’‘今天’。而目前就像过去,也似将来。所有这三个时间段呈现为一,为彼此相像者,而融入单一的目前,亦即永恒之‘现在’。形而上学称持存的‘现在’为‘永恒’。尼采从永恒的立场出发,也把这三个时间段设想为持存的‘现在’。但对尼采来说,这种持存不在于某种静态的事物,而在于同一物的回复。”^[11]所以“一切真理都是曲线的,时间本身就是个圆周。”^{[5]179}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永恒轮回还有复杂的伦理学要素,需要一种强大的意志才有勇气肯定永恒轮回的事物以及生命本身,因为伴随着永恒轮回的一定还有同样的琐屑与不堪。无论如何,尼采的永恒轮回,至少在存在主义之存在的意义上,是一种对永恒性慰藉的探求,这种慰藉不在他者而在自我,不在来世而在现世,既在瞬间又在永恒。无法掩饰的是,这种观点带有神秘主义倾向,一种直观的生命体验,正如弗兰克·梯利所说的存在主义的“一种变态的慰藉”^{[9]543},比如克尔凯郭尔的信仰、海德格尔的超越性存在或许会有争议但我们坚持认为其是加缪的荒诞激情。神秘主义一般产生于语言或思维走到尽头之处,这尽头之后是否确有某种存在,我们对此持保留态度,不做论断。

综上,在形而上学三个层次中反传统形而上学抽象方式或思维方式、反形而上学本体论以及反形而上学目的论的后期自称无比厌恶形而上学的尼采,又在三个层次上重构了形而上学,即:一、利用抽象思维为世界生成变化概括出一种本质或基础——权力意志;二、阐释或者建构人类主体性——超人;三、寻求一种时空超越性慰藉——永恒轮回。尼采,这位古典哲学的承继者与批判者,完成了形而上学史的一次巨大转折,而不是终结。后期的尼采与康德有着莫名相似,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他拒绝所有关于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传统论证,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从伦理学出发坚持形而上学的必要,人是自由、不朽的,上帝是存

在的。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在于,康德以道德法则作为基础,而尼采显然不会认同。

四、尼采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

那么,尼采没有实现的反形而上学在最可能实现的后现代主义中是否完成?尼采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广泛而复杂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尼采标志着一个开端,由此当代哲学才能开始重新思考。他毫无疑问将继续长期支配当代哲学的发展。”^{[9]99}尼采主要在思想的批判性、思维的方式、理论的视角等方面杰出地启示了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充满差异性的“内部”,每一位理论家所受的启示又都是不同的。德里达欣赏批判性的尼采,将尼采不激进的视角主义进一步发展。福柯承继了尼采的谱系学,假如他在后期成功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他最有可能成为尼采合格的继承者。利奥塔和尼采一样反对时代性的“宏大叙事”,虽然反对之后新的建构有所不同。尽管有着许多差异,后现代主义某些精神性的内核依然是可以把握的。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强烈反对统一性与普遍性,追求个体性与差异性。尼采自认为也是如此,他在《权力意志》一个题为“宇宙论价值的颠覆”的札记中分析了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虚无主义的三种形式,其中第二种就是对“统一”的寻求及其失落。尼采认为,形而上学者寻求一种终极实在的统一体,是为了让自己与其相联系,获得一种对人类价值的信念^{[1]32-37}。最突出的例子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所有个体性的“自我”与统一性的“绝对自我”概念相联系,经院哲学中也有类似思想。可惜的是,尼采在超人思想中似乎没能坚持这种反对,在《一千个目标和一个目标》中,尼采认为无需一千个民族的一千个目标,只需要全人类一个统一的目标——超人。^{[4]60-63}这是尼采在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破产”之后为人类建构的新的宏大叙事,无论如何,这个宏大叙事依然带有目的论色彩,它被后现代主义拒绝。“利奥塔自己提倡一种宽容、实用、多元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同样也赞美差异,避免僵化单一的主张,而且这个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小叙事的、‘本土的’、‘平行的’而非有上下等级的社会。”^{[9]92}更多的后现代主义者,根本不会提到自己对社会形式存有某种期待,他们专注于某个领域,而不是致力于建构一个完整的思想

体系。

后现代主义试图去做的另一点是重塑主体性概念本身,以一种新的视角与眼光看待人,尤其是人的身体。尼采对身体的重视使他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从经典人本主义的废墟之中打捞出—个积极人类主体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依然拒绝这一点。“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后现代主义),它继承了尼采哲学无神论的绝大部分;但是由于其街头化(streetwise)的风格,其拒绝超人的概念,它拒绝偷偷地用一个新形式的神来代替旧的那个。它质疑普遍人性的整体概念,它批判大写的人也批判上帝,如此一来就拒绝了人本主义类宗教性质的慰藉。……由于大写的人(Man)主要不再是被看作代理者或者创造者,他也就不再处于被误认为至高力量的危险之中。他最终达到了成熟,只不过以放弃自己的身份(identity)为代价。他不再被视作自我决定的,即在黑格尔和康德这类人看来那正是自由的含义。自我已经不再足够清晰来达到这个状态。这显然就是后现代反神学的方式之一,因为上帝正是唯一的,是自身存在的基础。”^{[10]209-210}人的尊严毫无疑问在这种质疑与重塑中受到损害,正如在达尔文那里一样,虽然进化论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都在否认这一损害。

综上,无论在哪个方面,后现代主义都认同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批判的方式,拒绝着尼采新的建构,它似乎消解着所有建构的可能,或许也在此意义上,它是真正反深度的、反基础的、反目的论的,这些都在暗示最终的反形而上学的可能。但我无法将反形而上学的实现归于后现代主义,它应当属于一个时代而不是某个流派,尤其是一个不稳定的、难以定义的、紧靠某种模糊的精神辨认的流派,甚至流派一词都存有争议。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形而上学自身消解的产物,而不是原因。现代主义终究没能完成对“上

帝之死”的补救,后现代主义则认清了这一补救的不可能并选择放弃。也正因此,不是后现代主义反对形而上学,而是后现代主义拒绝承认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争论的文化断层横亘在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正如一个时代的新生儿,彷徨不知所措,行着牛虻之事,因其任何更大的叙事都会被自身消解。形而上学也因此在今天真正成为一个受谴责的词汇,这一点或许才能归功于后现代主义。然而我们无法正当地为此庆祝,正如我们无法忽视当今世界普遍的文化困境。或许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一个处于形而上学史转折点的尼采是值得重读的。

后现代主义关注传统意义上边缘性的他者,关注身份认同,这些在中国是受欢迎的,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注定无立足之地。中华民族这一古老民族,从来不缺少民族之根,多少次外来的或内在的磨难,都无法损减我们的民族认同,正因为我们有统一的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在不同学说中有不同表述,是儒道的“内圣外王”,也是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一信念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有了更加合理的内核。马克思在形而上学史中与尼采同样重要,但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反目的论可能造成的危险。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新的宏大叙事,尤其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之后,成为儒释道等各种传统思想的新的科学解释。

习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互鉴”理论是我们借鉴与批判西方理论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新时代的宏大叙事,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宏大叙事的重要阶段。这一宏大叙事必然会增强我们的民族根基,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论建构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走出业已僵化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同时不至于陷入后现代式的文化困境之中。

参考文献:

- [1] 周国平. 尼采与形而上学[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 [2] 阿尔贝·加缪. 西西弗神话[M]. 沈志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3] 吉尔·德勒兹. 尼采与哲学[M]. 周颖,刘玉宇,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 [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钱春绮,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5] 尼采. 权力意志(上、下卷)[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5.
- [6]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5.
- [7] 乔治·迈尔森. 尼采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沈春花,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85.
- [8] 弗兰克·梯利. 西方哲学史[M]. 贾辰阳,解本远,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42.
- [9] 特里·伊格尔顿. 文化与上帝之死[M]. 宋振超,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10] 刘小枫. 尼采在西方(重订本)[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 戴维·罗宾逊. 尼采与后现代主义[M]. 程炼,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nd Nietzsche’s

WANG Zhongxiang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Nietzsche insisted that he was a thorough anti – metaphysics in his later period, but he did not realize, or refused to admit, that after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he constructed a new metaphysics completely. Nietzsche’s criticism is mainly aimed at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abstract mode or mode of thinking, metaphysical ontology, metaphysical teleology, and reconstruc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levels; first, Abstract thinking is used to generalize a kind of essence or basic power will for the world; second, to explain or construct human subjectivity-Superman; third, to find a kind of consolation beyond time and space-eternal reincarnation. Nietzsch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square metaphysics has great turning significance. Postmodernism inherited Nietzsche’s critical elements and rejected its new metaphysical construction. This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metaphysics itself rather than the reason.

Keywords: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metaphysics; power will ; overman; eternal samsara; postmodernism
(责任编辑:沈建新)

(上接第 26 页)

参考文献:

[1] 刘能.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形象地位变迁和分类框架再构[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2):53-59.

[2] 梁枫,任荣明. 基于利益相关和相对剥夺感的群体性事件动机城乡对比[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1):92-100.

[3] 黄伟强. 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中的执法规范化研究[J]. 公安教育,2017(6):42-46.

[4] 王耀. 基于政府信任视角的群体性事件治理对策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6):190-191.

[5] 易承志.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29(4):5-14.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Mass Management and
Civil Rights Protection

——Taking the Disposal of Group Events in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s an Example

TANG Tianfeng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disposal of group events caused by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should be regarded as mass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s, further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mass management", appropriate legal and policy guidance, effective training, detailed planning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re the path choice for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implement mass management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roup events.

Keywords: mass incidents; mass management; civil rights protection; path
(责任编辑:李 军)